

漓江出版社

桂林抗战文化史料



第28期
附第29期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桂林平史

桂林抗战文化史料

林煊平

桂林文史资料

第二十八辑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主编 魏华龄
编辑 周德荣
助编 唐晓敏

(桂)新登字03号

桂林抗战文化史料

桂林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

魏华龄 主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22000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ISBN 7—5407—1672—X/G·487

定价: 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但願人長久千里

共伴一宵

為一鏡奔流，秋才

夢夢月夜

振作精神 向前出發

把人生心方向却記在心尖上

是程流一五九八

得志時是這樣
未志時還是這樣

梅雪紅陌上柳絲

儿时读大书上山游一青童记

綠池蓮葉子聲

至方，得道无边 未以方

朝思又一

船行共勉

宗基

月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



子

目 录

- 周恩来为桂林抗战文化城奠基……………黄启汉（1）
- 胡愈之同志在桂林的活动概况……………吴支华（6）
- 缅怀我国剧坛猛将田老大……………曾仲云（10）
- 回忆抗战中田汉同志在桂林
- 关于田汉在桂林时的党籍问题……………杜宣 刘平（14）
- 民主战士张志让在桂林的抗日实践……………曹裕文（20）
- 生活的最强者……………林焕平（37）
- 怀念余所亚同志
- 穆木天、彭慧在桂林……………吴天佑（39）
- 吴伯超抗战初期在桂林……………陆华柏（51）
- 陆华柏音乐年谱……………戴鹏海（57）
- 桂林拓荒时期（1937—1943）
- 《新华日报》是革命的灯塔……………葛 敏（123）
- 回忆在《新华日报》桂林分馆门市部的战斗生活
- 真理的声音封锁不住……………卢 杰（133）
- 关于《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分处的点滴回忆

关于《新华日报》的回顾	黎远明 (140)
统战工作的一曲凯歌	吴颂平 (146)
——记《救亡日报》和桂系打交道	
《南方》忆旧	宋屏 (153)
——访艾青谈《广西日报》副刊	
忆《广西日报》昭平版	李梅甫 (157)
抗战初期的《广西日报》	张洁 (177)
我和桂林《力报》	冯英子 (185)
回忆桂林《力报》	
.....欧阳敏讷遗作(口述) 谭瑞芝记录整理	(199)
桂林《扫荡报》札记	张鸿慰 (224)
我所了解的桂林《扫荡报》	麦浪 (233)
在广西省立桂林广播无线电台的日日夜夜 ..	温致义 (251)
我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所做的几点工作 ..	林焕平 (262)
——回忆录的一节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社会科学	魏华龄 (269)
七星岩前的小木楼	曾仲云 (289)
——文化人聚居处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鲁迅研究活动及著述记事	
.....	艾林 (298)
桂林、武汉、《自由中国》及毛泽东的题词	
.....	章绍嗣 (310)
抗战时期学生生活片断	植恒钦 (314)
抗战期间广西桂林中山纪念学校幼稚园忆略	
.....	金恒娟 (322)

周恩来为桂林抗战文化城奠基

黄启汉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文化界、教育界进步人士纷纷来到桂林。特别是原先在武汉云集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作家、诗人、画家，和剧团、歌咏队、报刊、出版社、书店等，随着1938年10月我军自武汉撤退，亦退到了桂林。他们在桂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气氛弥漫全城，使这个风景迷人的城市，成为西南抗战文化中心，在我国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章，饮誉中外。当时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曾三次到过桂林，他利用公开的合法身分，亲自从事贯彻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工作，宣传毛主席的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奠定基础。

桂林是国民党桂系的根据地。此时，桂系的领袖之一白崇禧——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主战派，出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同时担任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掌管长江以南的第三、四、六、九战区的军事政治工作。还在武汉的时

候，他同周恩来常常见面。1938年2月，广西学生军开赴前线路过武汉，他邀周恩来向学生军作讲演。3月上旬，日本侵略军在津浦铁路北段大举增兵，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白崇禧奉派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他在行前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他的寓所，请教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建议：在津浦铁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周恩来的这个建议深为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这个建议，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大捷，举国欢腾。

其后，白崇禧从武汉撤退到长沙途中，汽车坏了，停下来修理，恰巧周恩来乘车路过，周对白说：你的车子不知修到什么时候才好，后面敌人的骑兵说不定很快会赶上来，不如请上我的车先走一步为好。白接受了周的邀请。在漫长的旅途中，周恩来不放过机会，再次做白的思想工作，两人一路谈得相当融洽。不久，周恩来、白崇禧双双出席了11月25日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白崇禧在会上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并说要全国人民都看。会议还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的班主任由蒋介石兼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周恩来于12月3日经衡阳到达桂林，他以超人的才智，巧妙的策略，说服了白崇禧，要他以团结抗日为重，切实保护

在桂林的教育界、文化界，和其他进步人士的安全，并支持他们的抗战活动。白崇禧欣然同意，并先后分别召见了广西绥靖主任公署参谋长张任民、行营谍报组长杨继荣和绥署第一宪兵团团长邓光伦，晓以抗日救国大义，说明非经他本人批准，不许对桂林文化界进步人士和文化团体、报刊、书店进行搜查、干扰，更不得私下抓人。

周恩来还对经白崇禧同意建立起来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做了详细工作布置，并会见了从武汉撤退来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后来桂林文化界的抗战活动，实际上都是在八路军驻桂办事处领导下进行的。12月8日周恩来参加了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在大华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更加广泛地与到会的各界知名人士马君武、李任仁、雷沛鸿、陈劭先、陶行知、千家驹等接触，向他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同时精辟地分析抗战形势，指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周恩来语惊四座，极大地增强了与会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1939年2月周恩来第二次到桂林，再次会见白崇禧。这时，正当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纲领不久，各地限共、反共的事端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有些地方还发生暗杀共产党人的事件，一股反共逆流到处泛滥，可是周恩来却仍然应白崇禧的邀请，出席2月16日在桂林行营大礼堂举行的庆祝军训部成立一周年紀念大会，并作《目前抗战形势》的长篇报告。周恩来理直气壮地指出：日敌泥足深陷，“速战速决”的政策已彻底破产，它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愈来愈暴露出来；国际形势也逐渐对我有利，我们坚持长期抗战，坚持同仇敌忾、团结战

斗，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周恩来的报告，给1000多听众极大的鼓舞，全场掌声雷动。过后，《广西日报》作了报导，影响深远。

也是由于周恩来的影响，3月间白崇禧出席了胡愈之、范长江主持的桂林文化界在中山路桂林大戏院举行的一次大型座谈会，并作了题为《团结抗战》的长篇讲话，参加座谈会（实际上等于报告会）的人，坐满了整个戏院。白崇禧强调在民族生死存亡“千钧一发”的时刻，除汉奸卖国贼外，都应当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团结才能抗战，团结才会带来胜利。他讲完话之后，全场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革命歌曲，气势激昂，歌声宏亮，震撼场内场外。事后，第一宪兵团团长邓光伦对我说：“那是共产党和左派文化人组织的大会，白主任（指白崇禧）怎么也去作报告呢？”我说：“这个问题，你想一想就会明白，它表明白在支持桂林文化界的工作，要我们上下一致，维护桂林团结抗战的局面，不许出任何差错。”邓点头领会。

这样，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居然在国民党西南最高军事机关的一个庄严大会上作报告；一个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西南最高军事长官——白崇禧，出现在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进步人士组织的大型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这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象征，是周恩来宏才伟略，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到国民党高层的反映；也是共产党人和桂林文化界进步人士对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反动纲领的一种反抗，与其他国民党统治区公开限共、反共的倒行逆施，形成鲜明的对照。

4月下旬，周恩来第三次来到桂林，这是他上次到桂林

之后匆匆奔赴赣浙前线视察新四军，和应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邀请到金华访问，共历时两个多月的回程。他跋涉千里，不顾劳累，座席未暖，即应文化界知名人士胡愈之、杨东莼、夏衍之请，同文化界进步人士100余人在大华饭店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分析抗战形势的敌我力量对比和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指出坚持长期抗战是大势所趋，是胜利的必由之路。他肯定文化界这段时间在桂林的抗日救亡工作，成绩斐然，任重道远，希望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事实上，直到皖南事变前，桂林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它一直成为国民党势力范围内抗战空气比较浓厚、民主气氛比较活跃的一个城市。

周恩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三次来到桂林，实际上为桂林抗战文化城做了奠基工作，为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活动铺平道路。当时我在桂林行营当上校秘书，在白崇禧办公室工作，周恩来在桂林的几次公开活动，我都有幸参加了。在大华饭店座谈的那一次，我虽然不是文化界中人，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特别邀请我参加，因为我曾以私人身分，同办事处的同志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胡愈之、范长江、张铁生、千家驹、张志让等多次接触，同他们畅谈抗战形势和对一些问题交换看法，得益匪浅。而每次听到周恩来的讲话，更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的伟大的政治家的风度，伟大的革命家的气派，豪言壮语，科学论断，至今使我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1994年7月3日于上海华东医院

胡愈之同志在桂林的活动概况

吴支华

胡愈之同志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他以“救国会”成员的公开身分，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和进步的文化活动。

1938年武汉沦陷后，他受周恩来同志指派，到桂林工作。当时由陈劭先（国民党左派，“救国会”成员）负实际责任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已成立，胡愈之被聘为研究员并任文化部副主任。1940年“建研会”成立广西宪政协进会，督促蒋介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施民主宪政。由陈劭先、胡愈之、张志让、陈此生等分别组成专题研究小组，进行研究、座谈。通过广西广播电台，广播对蒋介石“五五宪草”的反对意见。根据各小组研究的结果，由胡愈之起草了一份对“宪草”的宣言，揭露蒋介石假民主的实质。经过和桂系某些人的斗争，这份宣言终于印发全国各地，但《广西日报》不敢刊登。胡愈之等同志又通过金仲华（“救国会”成员、《星岛日报》主笔）的关系，在香港《星岛日报》全文刊载。这是胡愈之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中，发挥的一次重要作用。

1939年夏，李任仁、雷沛鸿、沈钧儒、胡愈之、陈劭先等20余人，倡议集资创立桂林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进步的文化生产工作，推定胡愈之、陈劭先、陈此生负责筹备。大家都公认胡愈之是“文供社”的设计师，关于“文供社”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资金筹集、人员安排等等，都由他负责设计、制订方案。当时确定“文供社”是个企业组织，由股东会决定一切，以此来摆脱桂系当局的控制。胡愈之是“文供社”的编辑部主任，他总揽编辑、出版业务，聘请一大批进步的专家、学者、作家和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参加编辑、出版、管理等工作，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有印刷厂、经理部等等。所用干部大部分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同志推荐的。当时“文供社”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出现，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一个重要文化阵地。在胡愈之主持下，“文供社”头两年着重抗战宣传，出版了一整套通俗读物，编印通俗杂志《新道理》等，对鼓舞民众抗日情绪，推进大众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1940年7月胡愈之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到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1946年夏他在新加坡从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那里筹到一笔资金，成立了香港文化供应社。1947年7月，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下令搜捕“文供社”和建设印刷厂工作人员时，陈劭先愤然离桂，到香港文供社工作，这是胡愈之深谋远虑，预留退路，同时也将进步文化活动、出版事业扩展到海外去。

胡愈之在武汉时曾和范长江等筹组全国青年记者学会，1939年春在桂林成立分会。开展了座谈、讨论、创办刊物，

举办桂林《暑期新闻讲座》等，由胡愈之主讲“各国新闻概况”。与此同时，胡愈之等同志又拟议组织国际新闻社，目的是打破国民党“中央社”对战讯的垄断和封锁，满足外国驻华记者的要求。1939年“国新社”在桂林正式成立，由范长江任社长、黄药眠任总编辑。胡愈之功成不居，退居幕后，担任特约撰稿员，实际上是运筹策划，掌握方向。如将记者来稿复写分发川、云、贵、粤、赣等地，使订阅“国新社”稿子的愈来愈多。这种发稿办法就是胡愈之同志设计的。范长江同志说：“胡愈之同志是我们进步文化界的参谋长。”这是对胡愈之出自内心的评价。“国新社”还在重庆、香港成立分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勒令停止了“国新社”的活动。但香港分社继续活动，收集全国各地通讯员（大部分是“青记”会员）的通讯，分发给海外华侨百余家报纸。这是在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布新闻以前，中国人民仅有的喉舌。胡愈之同志经常在桂林环湖路社址和同志们一起吃饭、工作、开会，编写通讯和评论。当时“救国会”在桂林出版的机关刊物《国民公论》，由胡愈之、张志让等四人轮流主编，每人负责一期。这也是胡愈之提出的办法，体现了他的谦虚谨慎精神，着重培养人才，担当重任。因而在1986年胡愈之同志辞世后，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天同志曾以“千功无一我，高山复景行”为题，发表悼念他的文章。

建国后，胡愈之同志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与萨空了等同志于1978年12月来南宁、桂林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并在这两地召开部分民盟盟员（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大家对落实知识

分子政策、发挥知识分子和盟员的作用等问题，提了一些意见、建议。当时大家还心有余悸，有些意见和要求还不敢大胆提出。胡愈之同志最后发言，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了一些，但还是不够的，党中央最近还要发个文件，对知识分子问题也要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还要进一步提高；还要更广泛深入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政策不落实，教育、文化、科学就不能上去。对这些问题，上面是很着急的，但各地还有不少中、上层干部，他们所受“四人帮”的流毒还未肃清，因而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未能完全解决，但问题总会解决的。民盟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协助党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个工作任务很艰巨，希望大家深入调查研究，多做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他的发言对大家是很大的鼓舞。以后形势的发展和他这些讲话的精神是完全符合的。

缅怀我国剧坛猛将田老大

——回忆抗战中田汉同志在桂林

曾仲云

“九一八”前后，田汉不但领导进步的南国剧社，还办南国艺术学院和出版《南国》月刊。在党的秘密领导下，他的魄力很大，白手兴家。当时他才过而立之年，但大家都尊称他为“田老大”了。

田老大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久，从湘、鄂前线又来到桂林。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了掀起文化工作的高潮，假座乐群路桂林基督教青年会草坪举行热烈欢迎田汉同志莅临桂林大会。会场上串串红灯出现在黑夜，夜色中一片红光。主持大会的是文协分会的秘书李文钊。李公和田老大都着军装，领章是少将（田是军委会政治部文委委员，李是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副处长），如此才能够压邪，那些鬼鬼祟祟的蒋介石的特务是不敢捣乱的。到会的还有欧阳予倩、熊佛西、孟超、聂绀弩、邵荃麟、李育中、林焕平、司马文森等文协和剧协的同志，及报界人士共100多人。我

是以文协分会驻会干事名义，通过李公的介绍和田老大认识了，他对我这个文艺战线上的小战士，给予平易的接近，后来又在戏剧方面给予我很多教益。

田老大在欢迎大会上作了湘、鄂前线和敌后文艺工作的报告，并对文化城桂林的文艺工作低潮作出今后如何掀起抗日文艺工作高潮的指示。这个文化界的盛会，直到11时许才结束。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到田老大的家——桂林七星岩后洞附近，花桥头那条街（街名我忘记了）。当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田老大不在家，由他的老母亲接待，这位戏剧家之母，还亲切地和我谈话，她老人家知道我是为了工作来的，就叹惜地对我说：“孩子呀，你为什么不上中学就出来社会找饭吃了？”我说：“这个世界不让我上中学读书呢！”她老人家又说：“寿昌（田汉的号）虽然比你多读几年书，但也经过一把把辛酸泪的年月啊！现在的生活也不好过嘛！”

抗战后在桂林出版的《戏剧春秋》月刊，就是田老大主持的，编辑是许之乔、杜宣两同志。田老大这次到桂林时，此间文化事业虽然在低潮中，但他仍努力扩大了我们的文艺战线，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张纯戏剧性的日报——《戏剧日报》（四开版，暂出三日刊），由归来同志负责编辑。同时田老大又在桂林组织“文艺平（京）剧团”，并为该团在桂林成立公演，编写了平剧《双忠记》，并假座国民戏院公演。那天田老大还送了招待券给我去观看。据许之乔同志的《田汉同志戏剧、电影作品表略》说：“此剧仍以无女角而不上座。”（见1979年《戏剧艺术论丛》第1辑64页）文艺平剧团成立